

不確定未來的澳洲社會工作教育

葉肅科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 Jim Iife (1988), "Social Work Education for an Uncertain Future", in Edna Chamberlain (ed),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ustralian Social Work, 1988, Longman Cheshire Pty Limited, Melbourne。本文是作者對澳洲政治、社會脈絡所作的簡要探討。藉此，他指出了四種和澳洲社會有關的主要趨勢：全球危機、福利國家危機、科技極限和自由的易變與限制。更重要的是，他確認了某些和社工服務有直接關連的重要論題。更重要的是，他確認了理解作爲一種角色，以及藉著技術干預和人性瞭解的不同提出兩難問題。爲了激勵創造力與想像力以應付未來的實際需要，他倡導一種較具知識挑戰的社工教育課程，這包括澳洲研究和歷史的嚴格研究。在他看來，透過如此多樣化的安排與設計，社工教育才能保有動力與活力，也較有能力應付未來的挑戰〕。

教育規畫的共同假設是：學生是爲現有社會中的現有勞動力作準備。對於社會工作而言，和其他專業與職業範疇一樣，教育者負責審查角色與職務，專家則被期望據此執行和設計課程。和雇主的密切合作被視爲是一件「好事」(good thing)，畢業生的立即雇用也被認爲是社工教育的成功判準。於是，學生、雇主和專業機構的期望都強化了此一觀點，然而，若以較具思考性和歷史性的教育原則來考量，這種取向無論對專業或對社工員所聲稱的服務社會，都將是構想拙劣的，而且也少有長期的利益可言。

在一位新社工畢業生的工作生涯中，澳洲社會將有可能產生重大的變遷。三十年後的社工職務之性質(假如它還存在的話)，將和今天的社工職務之性質有重大的差別，一九八〇年代的社工教育也可能不符二〇二〇年代的社工實

務之需求，這就好比我們現在來看一九五〇年代的社工教育一樣。對於所有社工員而言，誠如此例所示，今日的畢業生都需要充實其知識、發展新技能和界定新角色，以符合時代的需要。因此，社工教育的首要任務不僅在適應主要以技能界定的純規定角色，更在提供一種持續不斷的專業發展得以形成的基礎，並且授與畢業生以面對未來數年新挑戰的知識。評估社工教育的成功，以考察畢業生畢業後五年、十年，甚或二十年的能力與效率，是要比以評定他們在完學業後數週內被雇主立即「雇用」(acceptability)來得恰當。

本文主要在探究如何將諸如此類之因素納入社工教育的可行性。爲了進行這項工作，首先就得檢證澳洲社會某些可能的未來趨勢，以及今日畢業生在其專業生涯中可能面對的各種問題。必然地，討論將是思索性的與簡要的，但它卻也爲社工教育課程的設計提供一套考量的標準，這對明日和今日的社會都將是適切的。

澳洲社會的未來趨勢

在此，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四個主要趨勢：全球危機、福利國家危機、科技極限，以及自由的易變與限制。

全球危機

在未來數十年，全球危機的效應將威脅到人類文明的根本特質，澳洲也將無法擺脫此種威脅。晚近全球經濟因素對澳洲經濟的影響，已使人們意識到世界經濟景氣的重要性，以及未來的世界經濟是相當不穩定的(Jamrozik, 1986)。不管我們是否真正瞭解複雜的世界經濟，或是真正知道如何「處理」(manage)它，我們都將面臨此一嚴肅的問題。但是，顯然的，爲了維持和改善西方社會中的優勢地區之生活水準，世界經濟體系對全球資源和第三世界居

民的依賴會愈來愈大，而且剝削也會愈來愈烈。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這種成長與剝削不可能無限的延長；世界正步向此種「發展」(development)的極限。儘管，從 Meadows (1972) 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一書出版以來，許多作者和研究者均提出了警告，新的全球危機也時常發生(如表土的耗盡、臭氧層的破洞、第三世界的外債、車諾比事件的影響，以及晚近所熟知的若干實例)，但國際經濟秩序並沒有明顯改變的跡象。不管事實如何，假如這些問題已被適切的提出，變遷將是必要的。這種對變遷的抗拒，大大地助長了未來數十年內某種嚴重全球經濟或生態危機的可能性，這不僅會影響到整個人類，也將造成許多現今的社工活動被描繪成「隔靴搔癢」(deck chairs on the Titanic) 的理由。

用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矛盾會愈來愈明顯，依賴成長與剝削的資本主義體系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從全球或國際的發展來看，資本主義並沒有推翻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觀點。這可能使資本家對人與資源進行更大規模的剝削。資本主義的這種危機，會伴隨著生態危機一起到來，並且成爲現有社會秩序的主要挑戰。而這似乎又是未來數十年所有澳洲人必然面對的挑戰。隨著這些危機的到來，政治不穩定也變得更有可能，因爲，傳統的意識型態仍然在尋找它的解答當中。在此危機時代，政治極端論形成的可能性必然是主要的隱憂，我們不可能假設，澳洲相當溫和的政治思潮會無限制的延長。

經濟危機時代的另一項影響是：財富集中，資源掌握在有權者手上，無權者相對剝奪的可能性增大。很明顯的，在物質缺乏的時代，弱勢團體的負擔往往會更重，這實在不足爲奇，因爲，優勢團體有更多的權力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與財產。在經濟困難和高失業的時代，我們最可能發現的便是福利的不穩定、對社會安全少有慷慨的態度，認爲「我們可以不再提供社會改革」，以及照顧與共享社會理念的式微。

福利國家危機

有關福利國家危機，晚近已有許多文獻論及 (Mishra, 1984; Ofie,

1984; Taylor-Gooby, 1985)，在他們看來，社會服務的規定可說是西方工業社會最清楚顯現其自身政治、社會、經濟和生態危機的形式。大多數的社工員就是被雇用在這種現代福利國家的環境中，而且晚近幾年，福利國家的理念已逐漸受到批評，這特別是受到「新右派」(new right) 政治意識型態影響的結果。迄今，社工員所默認的福利國家的合法性，再也不能被視爲理所當然了。有些作者，諸如 Ofie (1984) 就說，福利國家的內在矛盾會變得愈來愈明顯，而且也比從前更難粉飾太平。

福利國家的矛盾既然如此，它們是不可能透過主要政黨的傳統政策執行即可獲得解決的，在未來數年，現代福利國家的合法性似乎還可能受到質疑。因此，社工員所要工作的制度化環境，將是一個不確定的領域，而且他們也不能再假設，利他主義和憐憫(更不用說社會正義)會被政治家、媒體和選民看成是國家的正當功能。對於社工員而言，清楚的表達其實務工作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理論基礎是必要的 (Lawrence, 1986)。在福利國家的結構中，假如它可以被實現的話，爲持續的福利國家活動作適當的辯護也是必要的。

科技極限

當前探討世界性問題的主要特色是：對科技寄以厚望。它假設，研究與發展的充分投資，高層次的科技或技能之應用，無論是核能廢料、表土耗盡、核武擴增、能源危機、第三世界饑荒、犯罪、都市衰頹或貧窮，最後都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同樣的，社工員也被科技解決問題的魅力所吸引。這已明顯的表現在和他們有關的技能，方法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模式上。社會工作目前有被重新界定爲根本是一種科技活動(並非道德、倫理和政治活動)的危險，實證主義者、工具主義者社會科學的強烈影響要爲此負起部分的責任 (Wilkes, 1981)。有趣的是，在科技院校中，社工的學術地位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這些社工系(所)的學術地位至今還有些擔憂，但是，對於社工教育在科技環境中適切的扮演重要角色的假設，則顯然少有存疑。

某些評論家指出，現代社會對科技典範的依賴是不恰當的，因爲，有許多的世界性問題是基本結構因素的結果，就算透過較複雜的科技也不可能妥善的

解決的。Illich (1973, 1977) 認為，我們正走向科技極限，因為，以科技解決問題的同時，它們也逐漸製造更多的問題。Schumacher (1973) 認為，重要的並不是發展新科技，而是適切的利用現有的低層次科技。誠如 Trainer (1985) 所說，對於解決全球和國家層次的現代社會問題，我們已知道該做些什麼？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更多的研究與發展，而是以政治和道德意志來引導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遷，已開發國家的過度富裕之減少、非成長經濟的發展和財富、資源與土地的再分配。在未來數十年，科技極限的問題可能會變成更基本問題之一。正因為人們已逐漸瞭解，科技並非萬能，因此，在處理社會問題時，融入較具創造力與想像力的結構性分析與人道主義者瞭解的精神是必要的。在選擇社工實際和社會政策發展的適當典範上，社工員對此論題必須達成共識，而且在尋求非依賴科技典範的社會「發展」(development) 之新探究取向上，也要表現出想像力與創造力。

自由的易變與限制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未來數十年可能是不穩定的與不確定的時代。當社會愈來愈不平等時，優勢團體和弱勢團體間的差距就必然會擴大，社會工作所要關心的就不僅此一趨勢。因為，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護優勢團體的利益與制度，不僅福利國家，就是現代各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都會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嚴重，並且採取必要的偏激手段。當一個政權受到威脅時，它可能會變得更具強制性以企圖維持權力和保護既得利益，對於公民自由、個人自由和政治言論自由的威脅也可能會因此增強。智利和南非可說是此例的他山之石，它們提醒世人，在民主社會中，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與特權會受到怎樣的威脅？未來，社工員執行社會正義的力量，可能會受到更嚴格的考驗。

社工服務的兩難

上述的解說，難免是推理的和主觀的，但是，在未來數十年，我們所概述的某些全球和國家趨勢，似乎可能影響社工實務的環境。假如我們所設計的社

工教育，是為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接受未來挑戰和面對不確定職業生涯做準備，那麼，確認某些和社工服務有較直接關連的重要論題也是重要的，在最近的將來，社工員有必要提出這些論題。以下所確認的就是許多此類的論題。

規模

社工員對費邊 (Fabian) 福利國家的理念有濃厚興趣，主要是受到諸如 Titmuss (1968) 等作者的影響。此一觀點把社會工作看成是由國家所提供之整合的、制度化安排的計畫與服務的一部分，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在照顧其公民的福利。這種探究取向促成了以服務救助、由中央組織與管理的大科層制結構的建立，據此，它是確保機會平等、取得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最有效架構。晚近幾年，大規模的和科層制的福利國家的效力，已逐漸受到許多不同觀點的抨擊。右派、中間派和左派的評論家都批評這個模式，目前，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現代福利國家對減少社會不平等，或促進社會正義的重大貢獻所做並不多 (Le Grand, 1982; George and Wilding, 1984)。現在看來，Titmuss 所寫有關福利國家的可能性是樂觀主義者的看法，這似乎是屬於不同的年代，而且福利國家也沒有循著他所主張的許多預期來走。

隨著地方社區控制的增強，分散化策略已被提出做為方案之一 (Hatley and Hatch, 1981)。然而，對於社會福利而言，是否以較零碎的分散化結構就可改善現有模式，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當然，它所解決的問題可能會和它所製造的問題一樣多。多年以前，Schumacher (1973) 和 Illich (1973, 1977) 就已倡導較小規模的運作，但是，就算社工員認為這些理念直覺上是吸引人的，他們通常也較喜歡費邊主義者廣泛的福利國家觀點。但是，在未來數年，現代福利國家的合法性，可能會愈來愈受到質疑，「大對小」(big Versus small) 的爭論將是這個問題的重點，這也是社工員必須面對的問題。

私有化

另一個對現代福利國家的抨擊，主要出自新右派與非新右派間的爭論：使

國家盡可能的「恢復原來水準」(roll back)，並把活動轉移到私有經濟部門是必要的 (Mishra, 1984)。這明顯的包括透過勞工契約、服務取得、證人或證件、企業主活動等福利層面的政府計畫。許多澳洲的社工員都可能受到私有化論題的影響。

贊成和反對私有化的論點很多，在此，由於篇幅所限，無法逐一列舉 (Le Grand and Robinson, 1984)。假如以該主題在專業著作上發表 (或未發表) 的論文數為指標，則澳洲的社工界似乎很不願意提到這個論題。社工員在私人機構中的合法性，似乎已被默然的接受。儘管，明顯的證據顯示，社工在私人企業的實際模式，是和該專業所宣稱為社會正義而服務的目的不相容，但是，至少社工員的某種活動，被適切的提供在市場上做為企業活動是默然的接受的。在未來數十年，假如想要釐清它的角色，澳洲社會工作就必須以較嚴謹的和系統的方式來面對此一問題。

社工員為管理者

對於社工員而言，尋求更有效的管理技能，已是一種愈來愈明顯的趨勢。這是社工員認知專業結構和重新界定社工活動 (包括福利組織的管理和較傳統的技能協助的角色) 的結果。假如福利國家的大科層制結構受到質疑，那麼，社工員為福利國家管理者的角色也會成為問題。必須慎重考慮的是：對於促進社工目標，換言之，對人提供適切協助和使社會朝向更合理境界，技術專家的管理/管理模式是否是最有效的方式？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說，技術專家的社會工作，與其說是較可能支持，毋寧說是較容易妨礙這些目標 (Rags, 1977; Wilkes, 1981)。對社工員來說，這是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當福利國家的危機日趨嚴重，社工員的角色也逐漸被深究，它就有可能受到重視。

社工員與福利國家

事實上，社工員對這種作法的適當性，顯然少有深思就逐漸採用技術專家的管理/管理模式，可說是社工員與現代福利國家關係模糊的一種指標。同時，社

工員也成了福利國家執行其計畫與政策的工具。再者，他們也成了福利國家的管理者，計畫並監督福利國家的干預。然而，有時候，社工員對其角色的界定，多少是自立於福利國家之外的，或擔任它的批評者，或做為福利國家活動後「收拾殘局」(Pick up the pieces) 的人。社會工作在福利國家中的角色之釐清，實在有其迫切性，因為，它的含糊正是社工角色界定混淆的原因。

社會正義何價？

在一種有利於政治與經濟的思潮中，要維持至少的或象徵性的社會正義是相當容易的。當這種觀點變得較不受歡迎和較少人接受，並且招致較嚴厲制裁時，我們就會顯得相當識時務。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澳洲社工員在這種情境下，要準備遂其所為以維持社會正義的道路還有多遠？對於社工員來說，有效地釐清社會正義價值，似乎變得更困難了，而且他們也需要更審慎的思考。從社會工作的社會正義模式退到較安全的和較舒適的治療模式之改變，是一種嚴格的考驗，因為，假如社工員是以社會正義的觀點來確保其道德的正當化，但適當的支持網絡也是有效的，那他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抵制。

技術干預或人性瞭解

晚近，已有著作對這種從高度依賴實證主義者社會理論與世界觀中發展出來的社工機械論的，干預主義者的和技術的模式提出重大的質疑 (Regees, 1977; Heinemann, 1981; Wilkes, 1981; England, 1986)。文章指出，一旦步入這種導向，社工員便會摒棄這種本質上是人道主義者的和倫理道德的探究取向，但這種探究取向所關心的，是瞭解和協助有困難的人，並非以「變動因」(Change agent) 來干預社會體系。連同前面所說的科技社會的問題，這意味著既有的社工理論與概念化的社工實務已面臨了重大的挑戰。明顯的，對於社工界來說，面對這種兩難，以及根據這種不同的典範來釐清社工角色，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社工教育的意涵

在前面幾段，我們概述了可能影響社工實務環境的某些重要趨勢，以及在最近的將來，社工界將要面對或可能面對的某些主要問題。社工教育的主要挑戰，就是在為社工員面對此類問題作準備，並且提供他們克服其專業生涯上的這些不確定因素。然而，假如社會工作的本質是一種和克服未來數十年之挑戰有關，且是重要的專業，那麼，以一種本質上是任務取向的使用動機來期望社工界，這未免是太遙遠的口號了。

從傳統的角度來看，社工畢業生的素質被期望要從專業的社工訓練過程中，獲得如下的知識：

● 社工知識：可區分成兩個次領域；有關個人和社會的理論性知識，以及有關資源、服務和法令等的實際知識。

● 技能：執行被界定為適當社工活動之角色與職務的能力。

● 價值：包括工具價值（例如保密）和終極價值（例如公平與社會正義）等社工專業價值。

● 敏感性：瞭解和洞察社會實體相當不同於其他專業人員的能力。

社工教育的主要爭論是擺在這四個特性、它們的相對優點（譬如，知識和價值比技能重要嗎？）、各別內容（怎樣的知識基礎是最適當的？）或是教學方法上（教育者如何傳授價值或提高敏感性？）

無疑地，這四個特性是重要的。多年來，它們就成了社工教育的基礎，並且提供了良好的專業訓練。但是，我們必須懷疑的是：對於社工實務而言，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它們是否足夠的？對於勝任社會工作，它們明顯的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是，要社工畢業生面對上述的問題，則可能是不夠的。社會工作已不能或不願再容忍許多這些重要論題，專業教育和社工員的社會化也無法幫助他們對這些問題作非常有效的反應。因此，為了使社工畢業生能在未來的澳洲社會中順利的工作，他們將需要兩種額外的特性；想像力與創造力。

假如他們要在這種看來似乎不確定與不穩定的社會中有效工作的話，社工

員所執行的職務，就必須超越其所學技能的簡單科技應用。必然地，在他們的訓練中，他們所學的技能將和昨日的而非明日的問題有較大的關連。對於社工員來說，能發展新技能和角色，是要比墨守成規來得重要。假如他們要對案主提供適當的協助，再假如他們要為促進社會正義而不斷努力，他們就需要發展並表現某種程度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一種專業上迄今都欠缺的能力。當社會工作的實際環境變得較不能預測，對社工價值也較冷淡時，適當協助的提供和為社會正義而工作就可能變得更困難了。未來的社工員，需要的是眼光與靈感、詮釋和釐清不同觀點的勇氣與想像力，而且經常要積極的解決個人與社會層次的問題。此外，社會工作也可能因失去和今日重要論題的關連，以及因支持本質上保守的、治療的實際模式的危險，而逐漸變成一種邊際的或不起眼的專業。

因此，社工教育者的職責，是在設計並傳授鼓勵學生質疑、發展創造性觀點、運用其想像力，以及發展如何導向更合理社會的觀點，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所學的技能，又可在現有結構中發揮服務救助的功能。這種要求社工教育課程著重教育而非單純訓練，鼓勵學生思考與探討而非單純學習是相當重要的。這種哲學可說是對當代澳洲教育主要取向的還擊。

晚近幾年，教育的爭論幾乎只限於探討如何為學生提供最好的就業市場，而非如何培養可以滿足未來社會需要的優秀畢業生。由於這種自由的、人道主義者的教育哲學並未受歡迎，因此，對於教育者來說，清楚而強烈地釐清這種社工教育的目標，並陳述其教學方法的明顯理由與理論基礎是必要的。對於社工教育者而言，遵從工具主義者科技典範的壓力很大，而且要為基金會、相關協會、雇主、學生和某些專業人員提供較具創造性的自由的、人道主義者探究取向的辯解，通常也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唯有循此哲學，社工課程才能培養出足以克服不確定性和處理上述重要論題的社工畢業生。

課程發展

為了發展一種可以激勵創造力與想像力的社工教育，社工課程有必要納入

另一新面向。對於大多數的課程而言，傳統的社會與行為科學都未提供一種啓她探討其他觀點的基礎，而且也沒有鼓勵創新的思想。課程發展的這兩個範疇可以有別於此，而且也可以使社工教育更具挑戰性、啓發性和創造性(見 Hie, 1986)。

知識的面向

在當代澳洲，反知識論是相當活躍的。和其他教育者一樣，社工教育者也不斷的面對違從反知識論規範的壓力。大多數的這種壓力都來自學生，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只在尋求簡單答案，想被告知「如何做它」(how to do it)？並且企求簡易的科技解決方法而已。本質上，這種觀點把社會工作看成是科技的應用，實在少有獨立思考、批判、反省或懷疑的能力。它所追求的是一種確定的、有目的性計畫變遷的世界。

這種對教育的探究取向，已在許多社工理論概念化的過程中被強化。在教育機構裏，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者典範，可能已對社工的學術責任盡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它必須被審慎質疑的是：在不確定的未來，它是否能成爲有效應用的適當典範？透過自然律的發現（主要是因果關係），它試著瞭解世界，然後，因果關係又被用來引導社會變遷或社會控制。這促成了方法論、測量、經驗證明和機械論者世界觀的強調。它也強化了應用社會科學家做爲專業社會工程師和政策分析師的角色（Fay, 1975）。採用這種典範的社工教育，傾向於把社工員看成正是這種應用社會科學家，因止，也就特別強調普遍可應用的理論（如系統理論）和社工員教育上複雜的經驗方法論。在 Joel Fischer 和其他人的某些作品中，這種趨勢已達其化約論者的極至（Bloom and Fischer, 1982），它企圖把個案工作重新界定爲單一研究的個案設計，社工

員的角色則是經驗研究者。

目前，有關於此一探究取向，文獻已有廣泛的批評，在此，由於篇幅有限，無法對社工實證主義者社會科學的理論性、邏輯性和意識型態的見解進行評論（Wilkes, 1981）。然而，實證論的影響仍然很強。目前爭論的目的，主要在於它呈現的是確定而非不確定的世界，社會生活也被化約成一系列易學的通則，因此，這也意味著，社工教育應試者爲學生提供「如何做它」的各種簡易答案。它並不企求刺激創新的不同觀點。簡言之，它並不鼓勵知識的使用，這正好給澳洲社會的反知識論者很好的生存空間。

爲了設計一套較具知識挑戰性的社工教育課程，考察過去啓發人們尋求不同觀點和發展創造力與想像力的要因是必要的。事實上，過去的研究本身可以爲學生揭露全新的世界，只要藉著以下觀點的強化即可達成：現有社會秩序沒有持續的永恒、還有其他各種社會、其他世界觀，以及其他組織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方式。目前，歷史研究並非特別的流行（和其他傳統學科一樣，它已陣亡在科技關連的祭壇上），但是，對於今日的社工學生而言，假如他們真的要克服未來數十年的挑戰，實在很難想像還有什麼較適當的學科？也許，簡直沒有比社會福利史更需要被研究了。該目標並不在提供學生瞭解事實，毋寧是要啓發他們的心靈，給予他們刺激與挑戰，並且說：「天上、人間有著比你哲學想像更多的事物」。

對於社工課程經常被遺漏的部分，歷史並非唯一可以提供知識啓迪的研究領域。藝術、音樂、宗教、戲劇和文學都可啓發人們採取不同的社會觀，或幫助他們瞭解人類現況。Humphrey McQueen 曾指出，對於啓發前人創新思想的來源，我們似乎缺乏瞭解與熟悉（McQueen, 1986）。譬如，聖經對許多社會運動與改革，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質疑就具有啓迪的作用。狄更生、莎士比亞和希臘戲劇家也扮演了這種角色。然而，這種豐富的文化遺產正在逐漸消

失中，而且正被一種平庸的流行音樂、商業電視和通俗小說的品味所取代，這顯然無法提供懷疑、質問和大膽陳述不同觀點的基礎。儘管，社工教育的主要目標是社會改革與社會正義，但重要的是，它也發現，對於這些文化影響或較現代的文化產物並未加以重視。這些研究領域非常可能刺激知識份子率先採用其他觀點，並為學生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作準備。

澳洲研究

澳洲高等教育的一個有趣發展是：企圖確立「澳洲研究」(Australian Studies) 的課程，這涉及各學科對澳洲社會與文化的瞭解(見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Studies Bulletin*)。對於實證主義者社會科學來說，澳洲研究無疑提供了另一種與地方情境有關，且對文化變異多少作些說明的其他不同觀點。同時，澳洲的社工教育也常犯了毫無批判的，就以相當不恰當的方式採用外國既有模式的過失(Healy, Rimmer, and Ife, 1986)。例如，把美國都市少數民族居住區之社區發展模式應用到遙遠的澳洲原住民居住區，或是把義大利既有的家庭治療技術應用到澳洲家庭，都是這樣的實例。

澳洲研究課程的主要動因，源自澳洲文學與澳洲歷史這兩個學科。儘管，澳洲研究的著作和社工教育有明顯的關連，但澳洲的社工作者對此顯然也有嚴重的缺失。強調澳洲研究的這種社工教育取向，將涉及澳洲文化所有層面的審慎檢證。這包括當代澳洲文學、藝術、戲劇、電視、電影和較傳統的社會科學等選擇性研究。那也就是說，透過藝術家 and 作者等媒介，相對提供了對澳洲生活最重要的詮釋與評論。譬如，藉著小說、短篇故事、戲劇和影片等選擇性研究，我們可以深入且有效的瞭解澳洲老人狀況或澳洲家庭生活。對於社工具而言，這種瞭解所以是有效的和有用的，正因為發展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傳統學科已提供了相當的基礎。

以澳洲文化研究為基礎的社工教育模式，不能被概括成普遍的因果法則。它既不能完全採信其他文化脈絡中的理論與研究，也不能把自己文化脈絡中的

理論與研究硬套在他人身上，因為，以澳洲經驗為基礎的教育是必要的。這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或容易解決的領域，學生必然要受此挑戰和面對困難，並且為自己作打算。因此，假如社工畢業生是為不確定的未來作準備，那麼，對於社工教育者來說，這是一個適當的教育取向。

結 論

本文，我們曾指出，對社工課程知識基礎的徹底再詮釋是必要的。毫無批判的就接受本質上為科技的、實證主義者的和工具主義者的典範，已使社工教育的能力遭到質疑，面對世界。澳洲社會和福利國家如此的大危機，這是以傳統技能為基礎的社工畢業生所無法應付的，社會工作所以會有逐漸被視為邊緣專業的理由也在此。假如要使他們能對澳洲社會發展有所貢獻，並且促進社會正義的目標，他們就需要洞察力、創造力與想像力，這是目前社工課程所欠缺的重要部分。換言之，這可藉由晚近幾年已漸佔優勢的工具主義者取向，轉向較自由的、人道主義者的教育哲學來完成。對於社工教育者而言，為學生提供原創性的、啟發性的多樣性的教育經驗本身就是一項挑戰。

本文所提的建議，不免是一般性的，對於未來社工課程而言，這裏所說的也是達成這些目標的可能方法而已。當然，這些建議並非全然列舉(無疑的，我們還可發現其他啟發學生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方法)。再者，它們也不可能被狹隘的規定。不同的社工教育者可以把這些建議納入相當不同的社工課程中。事實上，如此的多樣化，不僅可以維持社工教育的生動與活潑，而且也較有能力對未來的挑戰作反應。

參考書目

- Bloom, M. and Fischer, J. (1982), *Evaluating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Accountable Professional*,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 England, H. (1986), *Social Work as Art*, George Allen & Unwin,

- London.
- Fay, B. (1975),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George, V. and Wilding, P. (1984), *The Impact of Social Polic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Hadley, R. and Hatch, S. (1981), *Social Welfa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Healy, B., Rimmer, J., and Ife, J. (1986),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n Berreen, R., Grace, D., and Vinson, T. (eds),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86*,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 Helmemann, M.B. (1981), 'The Obsolete Scientific Imperativ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Review* 55, pp. 371-97.
- Ife, J. (1986),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Berreen, R., Grace, D., and Vinson, T. (eds),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86*,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 Illich, I. (1973), *Tools for Conviviality*, Calder & Boyars, London.
- Illich, I. et al (1977), *Disabling Professions*, Marion Boyars, London.
- Jamrozik, A. (1986),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Social Wage—Priorities and Options in Social Policy', in Jamrozik, A. (ed), *Social Security and Family Welfare—Directions and Options Ahead*,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Centre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no. 61,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 Lawrence, R.J. (1986), 'Future Directions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Australian Social Work* 39 (4), pp. 19-26.
- Le Grand, J. (1982), *The Strategy of Equality*,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Le Grand, J. and Robinson, R. (1984), *Privatis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McQueen, H. (1986), 'Cultures and Illiteracies', *Australian Society* 5, pp. 16-21.
- Meadows, D.H. et al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Signet Books, New York.
- Mishra, R. (1984), *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 Wheatsheaf Books, Brighton, Sussex.
-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Hutchinson, London.
- Rags, N.M. (1977), *People Not Cas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Schumacher, E.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Blond & Briggs, London.
- Taylor-Gooby, P. (1985), *Public Opinion, Ideology and State Welfar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Timuss, R.M. (1968), *Commitment to Welfare*,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 Trainer, F.E. (1985), *Abandon Affluence!*, Zed Books, London.
- Wilkes R. (1981), *Social Work with Underserved Groups*, Tavistock, London.

(本文譯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碩士，目前就讀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班)